

和谐中国 责任奥运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 2007 回顾

CSR in China 2007 Review

2008 年 2 月



企业社会责任同盟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lliance

目 录

前言	3
第一部 前世今生	4
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起源和发展	4
怀疑论者 PK 粉丝	6
新的方向：可持续发展	8
第二部 2007：中国在行动	9
政府篇	10
民间推动到政府参与	10
和谐社会的三驾马车	12
劳资关系的和谐	12
人与自然的和谐	13
节能型社会	14
不应低估的力量：制度的威力	15
公共政策	15
治理创新	17
法治树威	17
责任竞争力	18
企业篇	19
中国制造：麻烦不断的一年	19
出口加工业：总要学着自已长大	21
CSR：一个契机	22
强者：应以务实态度起示范作用	24
媒体篇	25
攸关的利益相关者	25
那些事情我们还历历在目	26
除了监督，我们还可以……	26
工人篇	27
这是一个可以用脚投票的年代	27
80 后“漂”的一族	28
CSR：工人不应缺位	30
第三部 全球化浪潮下的 CSR	32
供应链篇	33
气候变化篇	34
能源篇	36
未来：没人能置身事外	37

前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的学术界提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北美和欧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尽管十几年前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语境里是缺失的，但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在中国萌芽，亚圣孟子的《尽心上》就提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同时孔子的义利之辨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最朴素的表达。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国外掀起了一场浩大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要求跨国公司确保其供应链劳工的体面化。作为世界制造基地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次运动的冲击，而企业社会责任也随着这场运动进入国人的视线，开始在中国植根。

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开展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经过 30 年的励精图治，国力日益昌盛、国家和民族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社会和环境问题，譬如劳工权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企业对目前存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致力打造环境友好型、节能型的社会。至此，企业社会

责任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与中国当前以和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推动了人与自然、劳资关系向和谐的方向发展，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

2007 年，政府在公共政策、治理创新和法治立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公共政策的完善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氛围。另外，媒体监督、工人授权和企业主动性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本文通过回顾企业社会责任从欧美传入中国后的发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来阐述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与变化，对 2007 年发生在中国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典型事件进行回顾，展望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展现读者一个全面、真实、客观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帮助读者从起源、发展、壮大和融入等多方面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通过本文，读者还可以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在 2007 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发展所作的努力，这些推动力来自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工人。

展望 2008 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的 30 周年以及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能向世界展示责任中国、和谐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动力。我们相信，在 2008 年，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必将向更务实的方向迈进，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第一部 前世今生

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起源和发展

近几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或普罗大众，在论及企业与社会问题时，均认为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企业处理与社会相关的问题，回应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其中包括股东、客户、消费者、政府、劳工组织、环保组织和员工等。从内涵上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传统企业经营理念的外延，从纯粹关注股东的利益延伸至经济利益以外的目标。

仅从字面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没有令人迷惑之处，但要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却非常困难。不同国家和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解释和期望不尽相同，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亦然，这和人权的概念有一定的类似。虽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内容上要达成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尚需时日，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核心内容方面日渐达成共识。主流的企业经营理念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事实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在 18 世纪就提到“商人可以同时发挥利己的审慎之德以及利他的公正之德”，说明企业在赚取利润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可以同时兼顾，并非具排他性。其后，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革，尤其在欧洲和美国。随着新技术的发明，生产和服务效率提升，主流的管理理念尤其推崇“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

济，同时工人阶级开始形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大型企业开始出现并迅速膨胀，这些企业的老板和创立者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而且最有权利的阶层。自由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的经营理念，将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引入商业社会，从而为激烈甚至残忍的竞争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至于企业要为员工谋福利，为社会谋福祉这些观念，根本没有植根的土壤。因此，尽管在 19 世纪晚期，西方出现了大量慷慨的慈善家，但只是以个人的名义捐赠，而不是代表企业行为。虽然这些企业家以个人的名义捐赠了大量的金

钱，但他们的企业在开展商业活动时，仍然严重剥削工人。



20 世纪初，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大型企业成为攻击的目标，被批判为反社会和反竞争。为了减缓

阶级矛盾，西方国家颁布了大量旨在保护工人、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兴起了一种所谓“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的自由主义神学主张，认为只讲个人得救的福音是不够的，还需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需将《圣经》所教导的“爱”和“公义”的道理贯彻于社会生活中；赞成改良主义，提倡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治改革，主张更多关注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利益。

因此，在上世纪 60-70 年代，西方兴起了各项公民权利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要求企业正视其引起的社会问题，譬如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因打击危地马拉（中美洲）工会，而遭国际工会发动全球性抵制行动。麦当劳汉堡包亦曾经因其生产破坏环境，而在多个国家受到环保团体抵制抗议。为了保护品牌和减低风险，大型的跨国公司开始自我约束，考虑减少企业经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世界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跨国直接投资剧增，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把其劳动密集、环境污染及健康危害性高之生产线转移到比较贫穷的国家。因为这些在南美洲、亚洲和非洲之国家，一般工资低、公民及劳工权利落后，政府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的管制比较缺乏。加之 90 年代互联网的出现，跨国公司负面新闻能迅速到达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消费者抵制运动也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进行，首当其冲的是服装行业。1991 年，美国著名的牛仔裤品牌商 Levi-Strauss 在类似监狱一般的工作条件下使用年青女工的事实被曝光。为了挽救公司的公众形象，该公司草拟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此后，北美和欧洲的人权行动主义者、工会和 NGO 将消费者运动的视线引向一系列大型跨国公司，诸如 Kathy Lee、the Gap、Nike、Reebok、Disney、Wal-Mart，其中多数公司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生产守则规定了企业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最低的道德标准，譬如规定全面禁止使用童工、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强迫和骚扰行为、禁止歧视行为、结社与集体谈判自由、保证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遵守最低工资与最高工时、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标准，并且要求分包商也必须遵守该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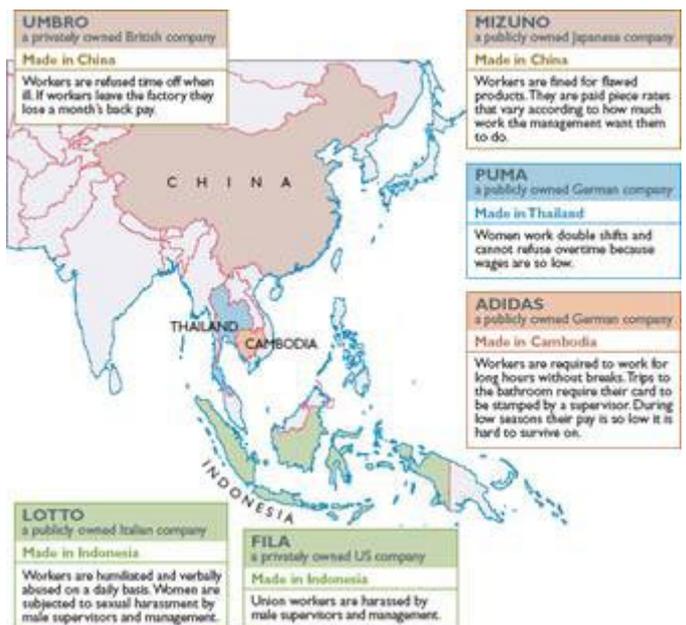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比生产守则要广，但是 90 年代兴起的生产守则运动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得到深远的传播，而这一思潮也逐渐成为企业治理的主流。生产守则是品牌商和零售商用于确保其供应链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以减少负面事件对公司品牌、股价和员工期望的消极影响。早期的生产守则运动或企业社会责任都是基于风险管理，被动应对媒体和相关团体的压力，缺少主动性，而生产守则也时常被劳工团体攻击为“公关伎俩”。亚洲资源中心（AMRC）的研究员就曾经指出，“公司生产行为守则不是为工人而制定的，只不过其内容和工人有关，它们是为其他

地方的观众写的一在大商场中，在校园中或者在网络空间。生产行为守则不是由中国或者泰国工人制定的。而是由芝加哥或者洛杉矶的经理们制定出来的，并且使用了一种迎合抗议运动和消费者行动群体的语言。守则不是和工人或者自由选举的代表进行协商的结果，而是媒体披露了令大多数欧洲和北美消费者无法想象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结果。它们是消费者威胁和抵制的产物。它们不是设计来改造亚洲工厂，而是用来保护和促进品牌和市场”。¹ 尽管弹赞之声此起彼伏，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潮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当里，经历了从怀疑、对抗向学习、变革和重组的变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迈入了新的世纪，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也随着新千年的开始融入更多新的元素，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联。随着世界新兴市场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因而，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开始进入企业社会责任讨论的议程，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新的发展方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最终目的是确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从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发展史来看，她的产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上而言，是资本主义改良的内在动力。20 世纪轰轰



1) Stephen Frost: Factory Rules versus Codes of Conduct: Which One Makes Sense for Bus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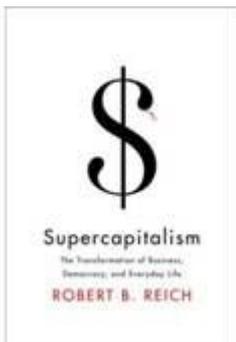
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家的案例比比皆是，劳资纠纷和对立是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和谐的结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遏制资本的过度贪婪，资本家开始进行自我约束和改良，通过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改善工作环境甚至出让部分股份的形式来缓和工会的压力和工人矛盾，以避免被工人“革命”。

从经济上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丑闻和负面报道将影响公司的品牌、销售额和股价，甚至能使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为了保护品牌和市场份，公司开始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再者，为了避免国家立法强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公司自愿履行社会责任能推迟政府立法，为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避免法律风险。另外，近年来资金市场上巨额的以“社会责任表现”为投资决策的基金也对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是工会养老基金。据统计，

超过一半的 2006 年美国《财富》500 强企业，工会养老基金是最大股东。工会养老基金管理部门完全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大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且，随着经济的稳健发展，工会养老基金规模在不断扩大，未来可能占有更多的企业股份，从而加大工会在股票市场上的影响力。

从文化上而言，宗教思想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潮得以发展的道德因素，譬如在美国，基督教新教兴起的“社会福音”自由主义神学，把改造个人推广至改造社会，把“博爱”和“公义”贯彻于社会生活中，主张更多关注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利益。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之所以在西方找到植根的土壤，是与资本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思潮必将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没人能置身事外。



怀疑论者 PK 粉丝

2007 年 9 月 4 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 (Robert B. Reich) 出版了新书《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与生活的转型》，主要谈及美国社会中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赖克是美国一位非常有声望的左

派经济学家。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里担任过劳工部长，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教授。在新书里，赖克抨击企业社会责任是破坏美国民主的危险因素，并认为公司“不能以社会责任为主导”并建议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人士朝更切实的方向努力——要求政府能更好解决社会问题，这比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加重要。作者认为，制定游戏规则确保公司在竞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不损害社会利益是政府的责任。

作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持反对态度让人们想起了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 1962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曾经明确指出：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按照游戏的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如此。1970 年，弗里德曼再次撰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他拒绝承认企业

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即使有社会责任的话，也只有经济责任。企业只需要为其股东赚取足够多的利润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无需关注什么利益相关者问题。弗里德曼认为，在自由企业制度中，企业管理者要对股东负责，而股东想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因此管理者的惟一使命就是力求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管理者把“股东的钱”花到公众利益上，他实际上就是在未经股东许可的情况下花钱，因而必须遭到反对。同样，如果企业从事某些社会行动而花费的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而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这个管理者就是在花消费者的钱，这种做法也应该遭到拒绝。作为一名复兴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旗手，弗里德曼认为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会使其成本增加，但市场的严酷性最终将会威胁到它的竞争地位。

40 多年过去了，赖克重新演绎了弗里德曼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论点，是老调重弹或旧曲新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者摒弃其一贯鼓吹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利润长期而言将达成一致”论调，而提出“为何资本主义胜利的同时民主却在倒退？”的疑问，其目的何在，作者想借此向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认为，赖克反对 CSR 的深层含义是不想企业权力膨胀削弱政府的功能，甚至损害民主。

赖克认为，消费者运动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迫使企业承担越来越多与股东利益无关的责任，譬如环保、动物试验、有机产品等。并提出，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代表不同身份立场的两个区域，一部分是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去思考，另外一部分是作为公民思考。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而言，我们乐意享受廉价产品带来的好处；而作为公民，我们又对提供廉价产品的企业诸多责难。赖克认为，消费者的自身矛盾开始危及了美国的民主：消费者运动迫使企业过多关注社会问题——这原本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企业为了减缓负面影响，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资源处理社会问题，甚至聘用游说团体左右政策制定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超级资本主义使得贫富差距成倍增大，企业权利的膨胀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这些由 CSR 运动带来的负面因素限制了穷人在社会阶梯上攀登的自由，进而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赖克认为，CSR 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成功。他认为负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利润越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当然，他并不否认企业有时候为了节约成本调整运营策略的做法恰巧与 CSR 活动人士的目标一致，譬如沃尔玛采用更便宜的“绿色包装”或星巴克为了减少员工流失而为兼职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但是，企业这些原本正常的行为被无限夸大，并被扣上“社会责任”的帽子，恕不知企业如此行为只是为了增加利润，不过是恰巧对社会产生了正面影响而已。赖克还提到，“更甚者，不少公司正使用 CSR 愚弄公众，制造问题已经被解决的假象，从而避免更具意义的政治改革。于政客而言，他们喜欢对备受公众责难的不良企业打分，譬如实施价格欺骗的石油企业，而不是改变管制机制避免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赖克在新书里公开批评了日益盛行的企业游说团。

CSR 拥护者的看法如何？《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文章提到，“极少人对政府是制定游戏规则主要角色的看法持有异议。但很多人也和赖克先生一样担心企业的献金会削弱政治的权力”。但联合国秘书长委任的商业和人权特别代表 John Ruggie 认为赖克的观点是“真正的落伍”。他认为，如果公民和政客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就不需要提倡所谓的 CSR。有远见的 CSR 拥护人士也一致认为企业不可能从事损害自身利益的活动，切实的方法是让他们实现长远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眼下短期利益。赖克轻率认为这种做法只是“精明的管理”并非社会责任。英国威尔斯亲王国际商界领袖论坛的 Jane Nelson 不以为然，“CSR 如果得到很好的执行，不仅能鼓舞员工的士气和增加品牌的影响力，而且可以造福社会。如果告诉企业无须履行社会责任，则使得他们错失这些机遇，反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

在《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与生活的转型》一书中，尽管赖克先生的本意是为了拯救美国倒退的民主，呼吁强化政府立法和管制解决社会问题，但他反对 CSR 的呼声还是招致了大量的批评。《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文章提到，“尽管本书论及了问题，但是资本家和 CSR 拥护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一论调非常天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 AccountAbility 的总裁 Simon Zadek 的观点，那就是有关是否推行 CSR 的讨论已经结束，是时候解决具体推行什么和如何推行的时候了？”

无独有偶，有关 CSR 的争论在中国的商业、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07 年 8 月 20 日发行的《经济观察报》刊登了国内知名学者张维迎先生的文章《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文章认为：利润就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适合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制度相互相承。揣摩张维迎先生的观点，不得不承认张老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观点同出一辙。不过，甚为遗憾的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弗里德曼式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受到了严重质疑，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弗里德曼的论断过于草率了一些。特别是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以后，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管理者都已经认识到，在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企业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注重生产安全、保障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等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这种思维在西方一些民主发达国家的确可以流行，但在中国就不能如此潇洒了。因为中国企业的确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同样“中国学者不能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本国的问题，西方国家不复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仍然存在”。他说到，“只追求股东利益的企业理念是陈旧的”，早期企业理念主要从为股东牟利出发，而现时企业理念更多地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公众力量大于资本力量的结果。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褒者贬者都各有说辞，但是对于企业而言，目前的重点不是决定要还是不要的问题，而是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反对的声音将被湮灭，尽管偶尔有点涟漪。

新的方向：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化的不断推进，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在 21 世纪，更多资源应被用于解决不平等、贫困和环境问题。

2007 年，石油价格的此起彼伏引起的恐慌和气候变化的悲观论调充斥着我们的视听，能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在中国，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建设“环境友好型、节能型社会”的决心，并“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² 而在世界范围内，备受世界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孕育了“巴厘岛路线图”，规定 2009 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安排举行谈判。由此可见，可持续增长成为 21 世纪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



在微观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论及企业社会责任时，频繁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名词。但是，CSR 并未被遗弃，反而成为谈论企业与社会时首选的名词，据国外 Ethical Corporation 杂志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1016 名读者当中，其中 CSR 拥有 345 票，占选票总数的 34%。其次是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企业责任）得票 225 票，占总票数的 22%。而让调查者意外的是，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得票 181 票，占总票数的 18% 让人更跌眼镜的是 Corporate Citizenship（企业公民）仅得 61 票，只占总票额的 6%。³ 尽管不同人在描述企业社会责任时使用的词汇各有偏好，但是在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一点上面，越来越多的人达成了共识。

无论人们在谈论企业和社会之间关系时喜欢用何种词汇，企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新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CSR 的内涵也将与时俱进，不断丰满并解决最迫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2) 《十七大报告》第三部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 Ethical Corporation 杂志网络调查结果

2

第二部 2007 中国在行动

2007 年 12 月 19 日，法新社发表题为“2007 年：中国崛起迹象随处可见”的年终特稿，罗列出了种种“迹象”：从“即将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股市壮观攀升”；从“反卫星试验”到“首次发射‘嫦娥一号’”。同时也剖析了崛起背后的“种种危机”，从“知识产权”到“贸易摩擦”；从“中国制造”到“人民币汇率”；从“能源外交”到“环境污染”。尽管国外媒体炒作“中国崛起”有各种居心，但是中国的崛起确实是事实，在连续第五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很快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2007 年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坚定了建设和谐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而在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开展日渐深入，民众的呼声和企业家的意识也日益提高。2007 年，制度和行动的互补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公共政策支持，而企业的主动性、媒体监督和工人授权的发展也为 CSR 的发展助一臂之力。

民间推动到政府参与

在 2004 年以前，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只限于民间的层面，政府很少参与。珠三角一带的出口型企业是国内首批接触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企业，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外兴起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有关。生产守则运动要求跨国公司确保其供应链劳工体面化，珠三角作为中国最早的出口加工基地，汇集了数以千计外向型企业，作为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一份子，不可避免地被动接受生产守则的要求。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在推行生产守则的主要方式是“验厂”——即委派内部职员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工厂进行生产守则方面的审核，审核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内部转达，通常不对外公开。如果工厂没有达到客户生产守则的要求，则可能面临撤单和终止商业关系的风险。据估计，自 1995 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至少已有 8000 多家工厂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有的企业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更多的订单，部分工厂则因为没有改善诚意而被取消了供应商资格。

尽管早期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出口加工区工人的权益，但是无论是在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对中国政府的冲击都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外部因素对国内的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造成了强烈冲击，它可能导致深层的政策思维发生重大转变。不仅地方政府不得不对跨国网络的人权活动做出反应，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得不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加以考虑。例如，中国加入 WTO 以后，关税壁垒逐渐消除了，但西方一些国家经常以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核心劳工公约为衡量标准，指责中国的产品或由劳改犯生产、或使用童工或者工厂缺乏安全和健康保障，对这类产品设置贸易壁垒。尽管中国政府反对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反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劳工标准实行贸易保护，但中国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国际劳动标准。更值得关注的是，跨国网络为维护劳工权益而主张的全球“订单选购”策略，构成了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有效压力。⁴ 因此，在 2004 年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体制对跨国网络的活动仍然比较排斥，这体现在 2004 年国内 SA8000 辩论白热化期间政府采取的态度。当时，国家认监委明确表示中国目前不宜推行 SA8000。

而民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是从 1993 年开始的。1993 年 11 月，

深圳市龙岗区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5 名青年女工被烧死，51 名受伤。为了替火灾中的死伤者请求国外客户的赔偿，香港劳工组织和慈善机构开始与国内的社会工作者和研究人士接触，商讨如何为这些受害者提供经济援助问题。致丽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劳工问题进一步的关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学生组织批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是“血汗工厂”的典型。随后，国外的慈善基金和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开展研究项目，探讨如何改善外来工的生存状态。

1993 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谭深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打工妹生存状况，重点分析外来女工在资本、外来工及当地社会这三方的关系中的位置，她提到，“外来女工相对于资本，她们只是廉价劳动力，她们的权益等社会利益由于工人与资本的对话能力太弱而往往不能实现；相对于当地社会，她们是外来人，在工人与外资企业发生冲突时，当地社会不能给外来人提供必要的支持”，⁵ 国内学者开始思考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确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1999 年，Levi-Strauss 公司通过亚洲基金会委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广东妇女干部学校实施“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培训”项目，参加培训的工人达数千人。2001 年，Pentland 公司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员工宿舍的调查，发表了“宿舍在中国——南中国住宿调查报告”，为生产商的宿舍管理提供参考。同年，由世界银行、国际青年基金会以及耐克（Nike）和 GAP 公司组成的“全球工人与社区合作联盟”（Global Alliance Workers Communities）在中国致力于培训劳工卫生保健、心理健康、劳动法和城市生活知识。2001 年 7 月和 2002 年 12 月，“锐步”公司在当地工会组织的指导下，帮助它位于深圳和福建的两家供应商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2004 年 8 月，FLA（公平劳工协会）在深圳举行培训会，对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SGS 等 5 家工作于中国内地的外部审核机构进行了互动式培训。2004 年 12 月，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驻香港总领事馆在深圳主办了“英国和大珠江三角洲区：共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大会，大会主题是展示企业社会责任（CSR）如何最大化地造就具有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的企业，增强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分享中英企业可持续

4) 郭巍青、黄岩：《跨国网络在中国的劳工维权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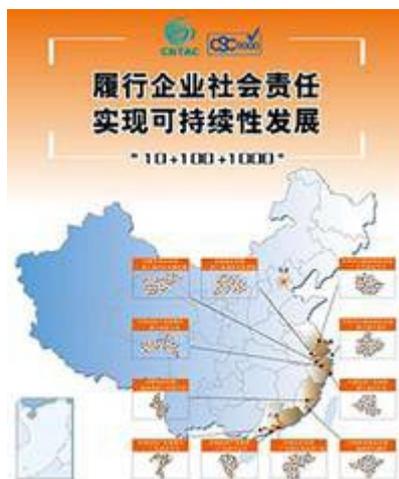
5) 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当地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

发展的经验。

民间力量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传播的另一个成就是国内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成立，譬如成立于 2001 年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便是一家专门维护劳工权益的 NGO 组织，旨在从调查研究、权利倡导、社会责任咨询、教育培训、法律援助、社区服务等不同层面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劳工维权机构是“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它在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EED）和福特基金会、挪威奥斯陆大学等机构的帮助下，在工伤探访、法律援助等方面为民工维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6 年成立的“女性联网”是由一群香港的专业人士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她们和深圳市南山区总工会合作，成立了女职工服务中心，目的是为广大女工提供支援服务，维护女工权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女性联网”活跃在患病工友中，开展各种活动，帮助工友走出阴影。

2003 年 12 月，《粤港信息报》发表的《美欲抡人道经济大棒 珠三角恐成重灾区》和《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美欲向我抡 SA8000 大棒 劳动密集产业厄运临头》两篇文章让 CSR 进入国人的视线。其时，国内对 SA8000 的认知分为两派，支持者认为 SA8000 是保护工人权益的有利工具，应当予以支持；反对者认为是变相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应当予以抵制。加之媒体的炒作和片面解读，有部分政府官员因此认为 CSR 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阴谋，是劳工壁垒。而且，SA8000 中的自由结社权利与中国的立法还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国家认监委明确表示中国目前不宜推行 SA8000。但是，政府、学术界开始投入资源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各种协会和研究中心相继成立。

2004 年 9 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要求全党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劳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与企业社会责任所提倡的目标不谋而合，于是政府开始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



再抱有防卫和抵制的心态。2005 年 5 月 31 日，中国首个行业自律性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CSC9000T 开始启动和推广，尽管其内容大部分是参考 SA8000 的条款，但是与之前政府抵制的心态相比，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了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实践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 CSR。同年 12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发起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成立大会”，会议弘扬企业社会责任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环境，并起草了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草案》，发

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这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全面推动企业承担起更多的人权、劳工和环保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采取行动，积极推动 CSR。

珠三角。2005 年，深圳市劳动保障局联合深圳市委政研室、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向深圳市政府提交了《深圳应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无论从进一步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保持出口优势，还是从化解诸多社会矛盾的角度，深圳都应当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05 年 7 月，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召开“百家企业谈和谐”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12 月，在深圳市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2006 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将“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列为重大调研课题，由市领导负责，市劳动保障局和市委政策研究室牵头，20 家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组成了课题组。2007 年，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提出设立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奖”，包括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市长奖”。

长三角。2004 年 6 月，常州市率先在全国制定了《常州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标准，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并具体规定企业在员工生活环境、健康安全、薪酬、培训等方面的基本标准；

2007 年，以政府名义颁发“企业社会责任奖”，以激励更多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获奖单位，可在 3 年内实行劳动、工商、安全生产等方面免于年检，并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今年 8 月，常州首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要求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每年通过职代会向全体职工报告转达。

在投资市场，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也开始植根。2006 年 9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根据该指引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制度，并倡导上市公司将自我评估的社会责任报告与年报同时对外披露。2007 年 12 月 12 日，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与泰达环保指数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泰达”品牌冠名中国第一支

环保指数，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公开发布的第一只社会责任指数。“泰达环保指数”从中国 A 股市场近 2000 家上市公司中选取为环保做出最多贡献、在经营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产生正面影响的 40 家上市公司组成样本股，通过定量指标直接反映中国环保企业的股价整体走势，间接反映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激励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上市公司做优做强。

2008 年，北京奥运将成为世界的焦点，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解决环境污染和中国制造问题的决心成为了政府当务之急。我们相信，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将有助于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的崛起。

和谐社会的三驾马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只有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在局部或区域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的总体和谐。

劳资关系的和谐

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 1.5 亿，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真正的主力军。由此结成的劳资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所以，劳资关系领域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领域，劳动关系领域的不和谐、不稳定，必然会对和谐

社会的构建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所以，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不仅有助于区域和谐和社会稳定，也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当前，我们劳资关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是不容乐观的，“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日益突出，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工权益被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特别是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公开指出，“近些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和因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5 至 2006 年的 12 年中，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 13.5 倍；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 5.4 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2006 年劳动争议案件立案总数为 31.7 万件，其中因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分别为第一二位，占到全部劳动争议案件的三分之二；而解除劳动合同争议占第三位，2006 件立案 5.6 万件。由此可见，劳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

键问题。

因此，政府提倡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缓解日趋激化的劳资问题和缓解社会冲突，而且可以实现社会的总体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进行着最空前的经济建设，以最快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胡鞍钢、世界银行、成思危等学者和机构均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现代经济繁荣往往是以高污染为代价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密集爆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就是这种发展代价的集中表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显眼的公共麻烦或社会公害。⁶

2007年5月，太湖无锡流域突然大面积蓝藻暴发，供给全市市民的饮用水也迅速被蓝藻污染。遭到蓝藻污染的、散发浓浓腥臭味的水进入了自来水厂，然后通过管道流进了千家万户。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锡自来水发臭，难以饮用，市场矿泉水（纯净水）供应紧张，整个无锡笼罩在饮水危机巨大阴影之中。6月11日，总理温家宝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研究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和措施。6月29日，温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把治理“三湖”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太湖绿藻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自2005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过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6年全国



十大环境事件中，有7起与水环境污染有关，其中有4起直接影响到附近居民的饮水安全。卫生部今年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不断恶化的空气和水污染，使全国范围内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增长：2005年以来，城市癌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9%，农村地区增加了23%。据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统计，中国每年早亡于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的总人数为75万人，每年共有1.9亿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患病。而且，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者张玉林说，环境污染在一些地方已经危及农民的生存权⁷，直接影响

中央推行的“三农政策”。据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海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书明的观点，农村贫弱群体的污染问题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地区的环境麻烦所造成的社会排斥已经突破了社会底线，把社会带入了高风险社会，并认为环境分配的“马太效应”⁸造成了社会的断裂，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社群却没有共同的未来。

社会的断裂，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社群却没有共同的未来。

2007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上百万厦门市民为了反对在厦门市周边地区建设一座投资14亿美元的石化工厂，通过手机短信组织起来，以和平的方式举行游行，抗议化工厂的建设。由于环保问题导致的厦门游行事件尤其引起领导者们的警觉。因为政府清楚地知道，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抗议有可能引发更加广泛的社会不安定现象。王书明认为，在传统文化延续的社会忍耐是他们最初的选择，因此中国尽管有污染问题，但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运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在中国污染不会带来社会风险。恰恰相反，欧美的公民环境运动是西方风险社会的减压阀。中国缺乏环境问题疏解通道会积累结构性社会怨恨，最终导致爆发不可预知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自救经常是最后的无奈的选择，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远远大于合法的环境运动。因此，必须从底层开始梳理社会关系、整治环境，为和谐社会减压。

6) 王书明：《生存权、环境权与社会排斥的底线》

7) 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渔村，海洋环境不公正致使他们由污返贫：受河流污染而形成的癌症高发村，村民由污致死，丧失生命权；走进城市的农民工仍然无法摆脱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噩运。

8) 环境分配的“马太效应”：强势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和越来越好的环境，弱势群体得到的是越来越少的经济利益和越来越糟的环境。

2007 年 8 月，国际奥委会（IOC）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警告，如果不能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可能迫使一些户外赛事改期举行，这为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庆祝活动投下了阴影。为了回应国外批评团体的忧虑，北京市委书记兼奥组委主席刘淇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对空气污染可能影响本届奥运会的担忧并不担心，中国政府已为这届奥运会投入了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本，并相信一年之后的今天，空气质量会有根本性的改善。2007 年 9 月 12 日，美国的铁匠研究所（Blacksmith Institute）公布



南地区显露端倪的油荒，逐渐酝酿成一场风暴，在 11 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延续多时。

11 月 21 日，纽约原油价格上扬至每桶 99.29 美元，创 1980 年

以来的历史新高。油价的节节攀升引起了世界对能源问题的思考，如何寻找可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了政府和企业未来能源政策的方向，同时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一个紧迫的问题。目前，中国能源效率目前仅为 33%，比发达国家落后 20 年，能耗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 3 倍，日本的 7.2 倍，而且中国主要靠煤发电，煤电占总发电量的 70%，过分依赖煤电反而加大污染治理的成本。因此，十七大报告要求“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并重申坚持节约能源的基本国策。

2007 年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地区，山西临汾和安徽田营镇名列其中。报告同时指出，全球污染危及到 10 亿人的健康，而在这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超过 1000 万人遭受着肺部感染、癌症和短寿的威胁。与 2006 年相比，田营镇是新列入 2007 年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地区之一，入选的原因是该地区的大型铅生产设备所导致的污染，占全国总污染的一半。

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因此，有效治理环境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而且也能提升被环境所累的中国国际声誉。

节能型社会

能源是世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充分表明：能源的增长速度与 GNP 同步增长，呈正相关。战后 50 ~ 70 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与充足的廉价能源供给，特别是石油供给密切相关。为此，能源供给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

在企业层面，由于企业能源消耗中占全社会能耗的比例最大，因而抓好节能降耗应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再者，如果企业能很好地履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必能实现社会的总体和谐。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短缺开始制约着 GDP 的增长⁹，甚至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2007 年 10 月 30 日，河南信阳两名司机排队加油时，疑因插队起争执，其中一人遭对方用扳手活活打死。11 月 14 日，浙江发生 200 人持铁桶闯入一加油站抢油的事件；在湖南、江西等省，有不少人专程跨省前往广东加油；而各地大大小小的加油站前，汽车排起长队等油……一场自 8 月份即在华

9) 广东省经贸委的 2004 年一项调查表明：缺电将对广东 GDP 增速的影响约 3 个百分点。

不应低估的力量：制度的威力

法治进步，已是当代中国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 2007 年，这一点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执政党身上。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大会报告重申“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在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07 年 11 月 27 日，党的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是一个信号，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内生要求，也是重要保障。

公共政策

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劳工和环境可持续需要政府营造一个有利的氛围。如果政府能够制订连贯的战略解决一些关键问题，营造出有利的氛围，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会完善社会和环境标准。2007 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旨在维护劳工权益、确保安全生产和治理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2007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72 次常务会议通过《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并在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实施前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以前在一些事故处理上，存在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问题。一些业主无视监管，无视生命，造成恶性事故，必须严刑厉法，“重典治乱”，并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罚金的最高限也已提高至五百万元人民币。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官员也表示，因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干扰多，此前对一些事故处理偏松、时间偏长、效率低下，实刑少、缓刑多、收监少。为此，新条例加大了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并全面规范了生产经营中的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程序与责任，并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事故调查

组成员、有关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条例的正式实施表明了中央政府治理矿难、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病问题的决心。

《劳动合同法》

2007 年 6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劳动合同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纳入了依法规范、依法调整的法制轨道，将为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与以往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相比，《劳动合同法（草案）》是历届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中提出意见最多的一次，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全国人大收到 19 万条修改建议，加之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与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有着切身的利益，部分外国商会对其非常不满，甚至暗示撤资威胁。后来由于国际媒体的介入，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



2006 年 10 月 13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中国法律草案将加大工会权力、结束劳工侵权》的文章，指责“美国商会——其成员包括戴尔、福特、耐克等诸多美国大公司——为了逃避新法赋予工会和劳动者的新权利，正在积极游说，劝说中国政府修改甚至放弃拟议中的新法”，随后，美国《新闻周刊》也发表文章《美国在华公司插足新劳动法：赢利高于人权》，批评“这些自吹自擂的公司正在游说中国政府在制订一个劳工法草案的条款时要对雇主手下留情，美国公司的这些做法，被劳工权益组织称为伪君子”。

欧美国家的一些工会组织也一改昔日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表达了支持中国政府出台改善劳工待遇法律的看法。2006 年下半年，荷兰工人联合会就中国《劳动合同法》问题在欧盟议会作证，要求欧洲企业停止对中国立法活动的干预，同时呼

吁中国政府尊重劳工权益，提高劳动标准。2006年10月，美国劳工权益NGO（Global Labor Strategies）发布一篇报告，谴责美国驻上海商会、美中商务委员会以及欧洲驻中国商会联盟对中国适当调整劳动法的极力反对意见，而适当调整中国的劳动法，将对外来工人有更好的工作保障及更合理的法律权益保障。同月，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 Lynn Woolsey 以及其他 25 名议员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对美国公司损害中国工人最基本人权、阻止拟议中的中国新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新权利和劳动标准保护的行动表示抗议”。迫于国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跨国公司和商会才开始妥协。至此，在中国除宪法外，还没有一部法律的通过像《劳动合同法》这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2007年底，由于部分企业错误解读《劳动合同法》，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企业解约潮。9月底，深圳华为公司通过了鼓励 7000 多名工作满 8 年的老员工“自愿”辞职的方案；10月22日，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比例超过 15% 的裁员风暴；11月8日，奥林巴斯被日本媒体炒作将关闭中国工厂，搬往越南；11月27日，中石化河南分公司花费 735 万将 144 人转为劳务工；12月15日，泸州老窖北京公司要求全员辞职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向人们显示，工人的处境和劳资关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局，表明了资方对工人权益的漠视和法律的狙击。因此，有学者指出，“要改变这个局面，政府就要信赖民间的自发力量，与社会力量分享工人有组织维权的空间，让它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问题。政府所要做的只是依照宪法，协调好公权力与社会自发力量之间的关系。靠着公私两支力量的共同推进，劳动者权益保护将不再会是一句空话”¹⁰。

《就业促进法》

2007年1月22日，一位 23 岁的大学毕业生在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一家港资企业，要求确认该企业以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为由不予聘用的行为违法，侵犯了他的平等就业权，这便是闻名的广东“乙肝歧视”第一案。由于法庭在诉讼期间两次调解没有结果，加之相关法规立法滞后，法官在裁断时也左右为难，案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7年7月30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和 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来到该公司的香港总部抗议其乙肝歧视行为，此次事件由于国外媒体的参与而备受国内外的关注。无独有偶，2007年05月17日，被惠普一家代工厂因携带乙肝病原被辞退的员工向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提交了厚达 300 多页的起诉材料，控告该公司歧视乙肝病原携带者，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协议解除书》，履行劳动合同，并向被告索赔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 50 万元人民币。案情由于牵涉国际知名品牌而倍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加之国内和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如北京益仁平中心和 SACOM 的介入，乙肝歧视问题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为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5 月 18 日发布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明确禁止企业招工时进行乙肝体检。而惠普代工厂乙肝歧视案，在政府和买家的压力之下，结果最终向有利于员工的方向发展。但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意见》仅是部门规章，没有上升为法律的高度，因此相关立法亟待起步。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就业促进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但是，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这解决了以往对乙肝就业歧视模糊的界定，为保护乙肝患者就业提供了法律保障。

政府除了通过订立新的法律保障劳工权益和确保安全生产外，在 2007 年还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并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修订案规定对未成年人实行全方位四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开宗明义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及参与权”四大权利，从公共政策和政府责任层面解决未成年工人的就业和保护问题。另外，《社会保险法》草案在 2007 年 11 月 28 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有望在 2008 年出台实施，对于解决社会保障实际工作中缺少法律依据或可依据的法律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再者，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工作计划，《劳动争议处理法》草案也在积极的研究和修订当中，同时残疾人就业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企业工资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修订）等行政法规的立法工作也在议事日程当中，并有望在未来几年陆续实施。

政府颁布一系列公共政策互补和强化了自愿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而且对于政府主动的参与确保了公司在社会及环境方面履行更大的责任。同样，政府的参与让工人权益的保护最终回到国家政策、依法裁决和工人集体行动等常规轨道上。尽管当前方兴未艾的生产守则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权益和保护环境，但从长远和有效的角度

10) 南方周末评论文章《解雇潮此起彼伏 公私协力才能推动劳动者维权》

看来，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很难在良好的氛围内发展。

治理创新

过去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习惯采取行政手段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许多问题已不可能仅由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总理温家宝曾经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发言上提出，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2007年7月1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并向银监会、人民银行通报了第一批蚌埠农药厂等30家环境违法企业名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潘岳认为，除了绿色信贷外，还应使用“环境经济政策”治理环境问题¹¹，包括绿色财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

2007年10月，为了回应国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制造”的攻击，国家环保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并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大对出口企业，尤其是“两高一资”出口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集中力量对有出口产品的排污企业开展一次专项环境执法检查，加强对此类企业的日常环境监管，建立出口企业的环境执法档案数据库管理，实现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整改的动态管理，并率先在冶金、化工、水泥、纺织、轻工等顺差规模大、增长快、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推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对查处属实的环境违法企业，按照《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在整改完成前，暂停受理其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申请，停止加工贸易合同审批，限制参加全国性、区域性出口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对情节严重的，可停止其1至3年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创新从一贯的罚款了事到努力利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和金融手段，促进行为的改善。

有鉴于部分地方政府过分注重GDP而违规审批或者跳过环保审批环节，致使环保工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尴尬场面，国家环保总局一直在呼吁改变政府考核体系，设计一系列政策与

制度去支撑科学发展观，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循环经济与绿色控制的法律框架等。2007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同意发改委、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分别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三个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三个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的颁布使得地方政府承担起节能和减排的责任，通过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为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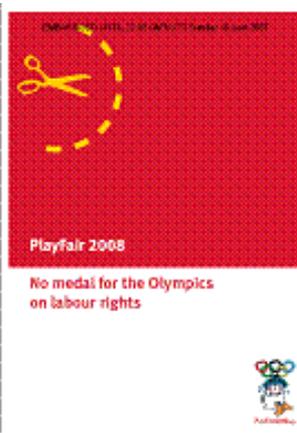
政府治理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创新，最终能确保企业有效地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确保国家的责任竞争力不断提升。

法治树威

2007年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提出十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在确保公共政策落实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加大执法力度不仅创造了公正、高效、安全、有序的法治环境，而且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2007年6月10日，工会及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 Playfair 2008“卧底调查”报告显示，为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生产手袋、背包和帽子等奥运纪念品的四家中国厂商，严重侵犯劳工权益并雇用年仅12岁的童工。报告发表后，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为此，北京奥组委要求深圳、东莞两地劳动部门组成调查组对四家特许生产企业的劳动用工状况进行深入调查。7月31日，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广东省四家奥运特许企业涉嫌存在劳动用工问题的调查结果，4家企业深圳和东莞各有两家。8月6日，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通报该市两家涉事企业处理结果，并对两家企业开出高达130余万元的高额罚单。

2007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英因受贿、玩忽职守罪在北京被执行死刑，这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加



11) 《经济观察报》：谈谈环境经济新政策 潘岳

大反腐倡廉治理力度的标志，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决心。在公司治理方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 2007 年 6 月 29 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9 月 13 日，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种种迹象表明，2007 年是中国法治树威的一年，是实践“良法之治”重要的一年。尽管是在蹒跚中前进，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007 年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展望 2008，法治环境的改善必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责任竞争力

2007 年 7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的一次部长级圆桌会议上，AccountAbility 发布了其第 4 份双年度报告——“2007 年责任竞争力状况”，中国的责任竞争力指数¹²排在第 87 位，是金砖五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排名最低的国家。

责任竞争力指数试图衡量在一个国家经济中的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全球市场竞争力。2007 年责任竞争力指数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增长竞争力指数（R2=0.85）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说明，责任和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最权威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乔纳森·拉什认为明智的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结合能使国家和企业获得先动优势，“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意味着能对长期表现做出回报的市场，意味着把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视为企业和企业管理质量的指导，意味着有助于企业采取正确行动的公共政策和公民行动”¹³，而且“责任竞争力不仅是在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时应该符合道德标准的问题，而是通过负责任的行为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尽管 2007 年中国的责任竞争力指数排得比较后，但是中国在男女同工同酬方面表现得比较好，在职业病和工伤保护方面也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在金砖五国中中国的政策表现最好。再者，2007 年责任竞争力指数中所包括的 108 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和规模差异，在分析不同指标时，必须考虑“污染避难所”假说¹⁴，并注意到“富有国家可以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输出到其全球供应链中去，从而获得高分，而这种输出将降低在供应链中承担较多活动的国家的分数”¹⁵。正如日本京都

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在《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一文中提到的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并建议“跳出 20 世纪旧有的思维模式，在整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制定一套合理的减排制度，而不是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作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只有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

2007 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竞争策略的变化。从强制关闭了生产污染食品的工厂、颁布新的劳工法律到严厉惩罚腐败的高层官员，从关注可持续发展到气候变化，中国正在转变其 30 年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污染”的出口竞争优势，向“责任竞争力”转变，积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同样，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环境问题是“对政府责任感的一种测试，也是中国应该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且，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软规则”标准的发起活动中，如赤道原则、“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森林管理委员会”以及“多纤维协议论坛”，以期能影响下一代标准的制定和保持长期竞争力。

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政府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是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的标志。而且，我们相信，21 世纪的中华民族必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2) 责任竞争力指数是英国社会与道德责任研究院(AccountAbility)在 2003 年提出的，用于衡量国家、地区竞争力的一个新的指标，包括在政策驱动、商业行为和社会推动三方面的表现，共 21 个衡量指标。

13) 《2007 年责任竞争力状况》前言 戈尔

14) 该理论认为：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保护强度或环境标准的国家之间进行着自由的贸易，那些实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由于其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差异，将导致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这样，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要低。

15) 《责任竞争力：中国的机遇》西蒙·扎德克

2007 年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富有挑战性的一年。玩具召回“风波”和一系列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不但影响了国外消费者的信心，而且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声誉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为此，政府在 2007 年重拳出击，加大了产品安全、环境治理和劳资问题的治理力度，并颁布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政策和法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保持活力和竞争力，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一味沉迷于过去单纯依靠成本优势原始积累的美好日子而不思变革，企业将被湮灭和淘汰。而全力打造企业的责任竞争力将是一个契机，而且有助于树立品牌和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制造：麻烦不断的一年

2007 年，与中国货有关的产品安全事件被密集地提及。

2007 年 3 月中旬以来，美国发生 4000 多起猫、狗等宠物中毒死亡事件。3 月 27 日，由 3 万名兽医基于网络组成的一个病例报告网已报告了与最近的宠物食品召回事件相关的超过 471 个肾衰竭病例。兽医信息网络的发起人保罗·派恩说，他的病例统计已经超过了 471 个，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并报告称宠物食物是因一种名叫氨喋呤的老鼠药的污染而致使宠物中毒。

随后，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上的报道纷纷用“生产有毒宠物食品的原料来自中国”作为标题，称该公司人士透露，“被怀疑含有有毒物质的麦麸是从中国进口的”。加之中国官方在事情开始否认中国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造成美国宠物死亡，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为此，2007 年 5 月 2 日，FDA 小组抵达中国，开始检验制造肥料与塑胶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melamine)，如何混入出口到美国的小麦麸内。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中国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小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初步认为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2007 年 5 月 8 日，国家质检总局承认，中国两家企业在向美国出口的饲料产品中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并宣布已对涉案的两家企业的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和监控。

宠物食物的调查余波仍未平息，一连串有关药品、牙膏、玩具安全的负面报道频频出现在国外媒体，对中国制造问题的穷追不舍突显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贸易摩擦的别有用心。渲染。

2007 年 5 月 6 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称：2006 年，巴拿马误将购自该国一公司的化工原料“二甘醇”当作“药用甘油”，用于 26 万瓶感冒药的生产中，最终导致上百人服用含二甘醇成份的有毒止咳糖浆后死亡。5 月 19 日，又以中国制造“毒牙膏”内容，称巴拿马市场上出现了 6000 管含有二甘醇的“有毒”牙膏，并认为是“由于中国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缺陷，导致悲剧发生”，报道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有关中国制造产品安全问题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出口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为此，中央领导人做出详细批示要求彻查“巴拿马二甘醇牙膏”问题和“巴拿马药品中毒事件”，并由国务院牵头会同质检总局、海关总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商务部等部门组成两个联合调查组，对“巴拿马二甘醇牙膏”问题和“巴拿马药品中毒事件”立即进行了调查。5 月 31 日，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巴拿马药品中毒事件调查结果，称事件直接责任在巴方。

2007 年 8 月 2 日，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美泰公司以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涂料含铅量超标为由，召回 96.7 万件产品。随后，美泰在一个月内三次宣布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总数达到近千万件，一时，美国媒体及部分参众议院再次掀起了指责中国制造的高潮。后经过双方联合调查表明，被召回的玩具全部



是由美泰在中国的合同供应商分包给分包商后制造的。召回的主要原因是因美泰公司在 2007 年 1 月实施了设计上的改进以提高安全标准。这些与设计相关的召回与中国厂商完全无关。9 月 12 日，美泰有限公司全球业务行政副总裁迪汤姆在接受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接见时表示，美泰公司近期几次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美泰愿为召回负全部责任，并就召回事件为中国制造造成的损失向中方致歉。

玩具召回风波开始转变为中国制造信任危机，面对西方媒体近乎妖魔化中国的局面，政府在处理信任危机时采取了务实的行动。2007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出席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她强调，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4 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这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国家形象的特殊战役，各地区、各部门要群策群力，坚决打好这场硬仗。10 月 17 日，十七大代表、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 17 日上午 9 时在十七大新闻中心接受了 20 多家中外媒体近百名记者的集体采访，回答了美国侨报、英国路透社、韩国中央日报和香港商报、澳门日报、台湾中天电视台等媒体的提问。李长江表示，中国制造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部门和媒体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过分夸大炒作，但事实胜于雄辩，世界各国最终会信任和青睐“中国制造”，并认为“国外对中国制造产生信任危机原因复杂，其中不乏贸易保护因素，甚至有偏见因素。但无论如何，中国制造已在全球无处不在，中国理应承担国际责任，彻底解决确实存在的部分产品质量问题。同时，继续推进外贸模式转变是树立中国制造良好形象的根本”。

虽然美泰的道歉在一定程度上力挺了中国制造，但是并没有减缓美国媒体推波助澜的反华情绪，加之美国大选在即，“这些健康忧虑进入政治层面……在美国，修理中国似乎用政治才是好办法”¹⁶，而且“各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围绕中国进

口食品的健康和安全恐慌来放大自己的呼声，他们呼吁在从贸易到人权等各个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民主党人正寻求利用很多美国人日益加深的焦虑，他们担心制造业就业岗位眼看着被中国夺走，以及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¹⁷。

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2007 年 12 月 12 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中信国安第一城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卫生部长莱维特等出席了中美经贸合作签字仪式，合作涉及高技术贸易合作、食品与饲料安全合作、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节能和环保产品检测认证合作、投资贸易促进合作、生物燃料能源合作、农业科技合作、环保合作、医疗卫生合作、旅游合作、绿色煤电合作等诸多领域。中美贸易对抗开始有所减缓。

然而，麻烦不断的中国制造让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制造的问题与出路。仲大军建议“面对这种有点妖魔化中国的局面，中国只能沉着应对，要先安内再攘外，先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譬如完善企业制度的建设，增加劳动权利的保障，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改变一味追求出口的发展目标，加强企业产品质量的管理等等”，并认为“中国制造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更多来自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这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因此，中国形象的提高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在国际上威信。有了政治威信，产品才会有威信”¹⁸，要主宰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政府必须尽早快速地出台各项法律法规，调整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强迫中国制造产生升级换代，进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最终走出高消耗、高污染、廉价出口的局面。

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有意作恶”并摒弃“迅速蔓延的重利轻义的资本主义风气”，并“向中国不断壮大的雇主和经理人群体灌输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维持一个企业的唯一办法是确保他们养成社会责任感。实际上，这是使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¹⁹。

16) 英国独立报文章观点 13) 《2007 年责任竞争力状况》前言 戈尔

17)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观点 15) 《责任竞争力：中国的机遇》西蒙·扎德克

18) 《中国制造的问题与出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19) 《德鲁克给中国上的课》美国《商业周刊》网站 2007 年 8 月 17 日文章

出口加工业：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2007年8月11日，53岁的港商张树鸿在工厂的货仓内上吊自杀，用一种剧烈的方式，展现了我国以玩具出口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严酷生态。自杀的直接原因，是8月2日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近百万件利达出产的含铅量超标玩具，利达公司为此损失三千多万美元。9月3日，在北京出版的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以“‘死亡阴影’下的珠三角制造”为题，刊登了记者发自广东佛山的报道，开头就引用了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洪启辉的一句话：“大多数企业都感到绝望了”，而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的自杀事件，又令这个行业染上了些许“凄风苦雨”的悲凉气氛。

出口加工贸易在过去的30年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起来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制造业吸收了接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一直维持在80%以上，创造了接近3/4的外汇收入²⁰。

但是，中国制造也暴露了很多弱点：首先是技术管理和生产经验上的欠缺，这种知识和经验上的欠缺往往会影响到产品质量。第二是生产设备上的欠缺，硬件落后也会影响产品质量。第三是劳动力素质的欠缺，大批年轻的外来工、临时工，有时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过硬。第四是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欠缺，由于中国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国家缺少知名企业和知名商业品牌，这种无形资产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制造的声誉²¹。而且“中国制造对国内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加之政府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执法力度不足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加剧贸易摩擦，助长贸易顺差的不合理增长，给中国产品的形象造成损害”。

再者，近几年国外劳工团体、工会和媒体过分渲染中国劳工问题和环境问题、指责中国进行“社会倾销”以及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让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博弈。因此，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

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²²，并要求企业“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整出口贸易的政策，触动了对成本斤斤计较的厂商的神经，加之“死亡阴影”的笼罩，业界一时充斥着悲观的论调。

2007年6月1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财税[2007]90号文件，宣布从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此次调整是目前出口退税制度最大变化的一次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主要内容一是进一步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二是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三是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表明了国家进一步控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7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共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列入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是最大规模加工贸易政策紧缩方案。而方案中要求“A、B类的东部地区企业，均需按应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总额的50%缴纳台账保证金”的规定给加工出口企业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少中小企业“深感绝望”。后来，经香港特区政府、珠三角各地政府和香港商界的大力游说陈情，中央政府对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保证金台账实转”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允许企业用银行担保（保付保函等）来缴纳，而不必支付大笔现金。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条消息时称：“此举可使超过千家港企避开倒闭结局”²³。

2007年10月8日，商务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出口制造商，

20) 《何为“世界工厂”？》新浪网 读书频道

21) 《中国制造的问题与出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2) 《十七大报告》

23) 《珠三角企“死亡危机”》曹景行

情节严重的将被关闭一至三年。

国家收紧出口贸易政策，对习惯于优惠政策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之“电荒”、“油荒”、“劳工荒”接踵而至，要素供给不足，土地、劳动力、能源配置等均出现瓶颈。出口加工业的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治理压力日益增大，制造业进入高成本时代。再者，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电费增加、工人工资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很多出口加工企业认为政府用“重药”会迫使一些企业转移甚至倒闭。但是，依靠劳动力成本和“二高一资”粗放型增长模式必然会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多，加大国内的通胀压力。再者，以牺牲劳工权益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利于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停留在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中国加工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朝附加值高的环节冲刺，加强自主创新，打造品牌以及开拓零售市场，这过程或有资金的压力，或有市场的风险，对企业来说可能非常艰辛，但这毕竟是一条长远的发展之路。

没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加工出口企业应该走出“摇篮”，开始去面对新的生存方式。尽管要改变近三十年形成的思维模式并非易事，但是只要学会自己长大，企业必然能在挑战中拥抱机遇，找到新的增长点。

CSR：一个契机

买家不断压价、生产要素配置瓶颈、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国家调整贸易政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将出口加工企业推向微利时代。如何在新的营商环境下获取竞争优势，成为每个企业亟待探索的问题。提升企业责任竞争力便是一个契机。

然而，要改变企业消极和被动对待 CSR 的态度尚需时日。在过去数年，珠三角出口加工企业是第一批亲历早期 CSR 运动的企业，他们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的监督。在旧时“警察与小偷”的审核模式里，企业消极地认为 CSR 是西方使用的变相“反倾销”、“粉色壁垒”。加之，2003 年媒体的错误解读，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对 CSR 的态度还是“防卫性”的，认为推行 CSR 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产品的价格，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和收紧贸易政策，企业要满足的“底线”越来越多，仅仅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为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很难找到出路。

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选择推行 CSR 的策略正值其时。成功推行 CSR 能为企业带来很多商业利益：可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降低员工流失率和提高员工士气和满意度，也能通过生存力提升提高企业的效率，同时推行 CSR 能提升员工的健康安全意识，提高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降低工伤；

实施节能和预防污染政策可以节省企业的管理成本和违法的机会成本，改善企业与社区、政府的关系，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2005 年 6 月，英国全球机遇基金（Global Fund）与综合开发研究院（以下简称 CDI）讨论开展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研究。本项目通过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方面取得较好成果的企业，对其实施过程和实施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特别是从成本、收益角度，使用财务数据论证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益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益处，起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深入推广的积极作用。项目小组通过六个可复制的典型案例分析论证了推行 CSR 是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而且项目小组认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对很多处于产业链低价值部分的加工企业来说，必然会增加一些成本负担，这不是针对一家企业的压力，而是对于整个制造业的要求，是大势所趋，只有正面积极地应对，才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在压力之下，寻求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转移，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而数量庞大的单元，如果不能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就更谈不上对社会有所贡献了。如果将企业利润建立在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的基础上，最终都将被社会所抛弃，任何有长远发展考虑的企业家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²⁴。

24) 《珠江三角洲 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研究报告》2005 英国全球机遇基金项目报告

2007年6月，美国高盛（Goldman Sachs）发布一份研究报告阐述可持续发展是如何转化成商业利益的。该项目选择了六个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部门包括能源、采矿、钢铁、食品、饮料和媒体，研究发现旨在通过推行环保、社会和公司治理政策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股价自2005年8月以来上涨了25%，在各自所在的行业，推行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公司中，72%的公司同期业绩表现超过其同行。同年，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发布研究报告，显示超过90%的首席执行官在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融入公司的策略和营运方面所作的工作比5年前要多得多。

2008年1月，由Cisco和英国电信（BT）资助的项目小组发布了题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新思维》的研究报告，研究者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持续发展或其代名词CSR被用作防范风险的管理手段。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顾客青睐那些全心全意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推动了企业的销售额和股价。现在，传统CSR观念正开始发生改变”。报告建议公司发展可持续战略，可分十步走²⁵：

1、言出必行：高层领导必须相信CSR。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经常倾听领导对于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以及他们实现变革的可能性。

2、建立一个有权处理可持续发展事宜的机构：大多数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的领先公司都建立了一个专门处理该领域事宜的委员会。其他部分公司是由非执行官负责，而有部分公司建立的委员会既包含执行官也包含非执行官。但是，无论架构如何，公司有必要让高层定期参与商讨可持续发展问题。

3、把可持续发展创新作为经营理念的一部分：更新公司的愿景、使命和一系列的价值观、原则，以确保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策略的核心。这样，公司被公众（无论是企业内部或外部公众）认为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竞争优势的企业。

4、制定公司制度：制定一份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守则，范围包括员工和商业伙伴，并声明任何不遵守该守则的人或单位不得与本公司建立任何关系。

5、与利益相关方互动：找出所有与公司营运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所在社区等，并与他们咨询可持续发展事宜。主动鼓励他们参与公司的创新并鼓励他们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6、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能真正发生效用，可持续发展必须作为商业战略全新的部分。简单把它归入到目前存在的战略有可能使得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边缘化，甚至变得无足轻重。

7、把可持续发展嵌入商业运作的方方面面：制定一个不断发展的流程以让公司的所有部门识别和理解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让所有部门考虑如何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进行创新。

8、以人为本：确保可持续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得到清晰的传达，无论是对员工宣导还是人员招聘、入职、绩效考核、报酬和升迁方面。建立一个专门基于可持续发展进行创造力和创新培训的机构。

9、参与各种活动：越来越多的旨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机构、网络和其他团体不断涌现。加入这些组织譬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其他类似的团体。加入可持续投资排名和监督譬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公司责任指数。

10、发布真实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时并不比“逐项核查”程序高明多少，而且被误解为所有公司都必须有一份。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公司除了记录其活动以外，还清晰制定政策并指出创新的方向。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与商业利益并无冲突，而且从长远的利益考虑，CSR还能增强企业的责任竞争力，确保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健康发展。

25) A New Mindset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强者：应以务实态度起示范作用

2007年10月，华为公司7000多名员工集体辞职事件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加之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前夕，引起了社会各种猜测、议论和评价，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华为一再重申此事件并非针对《劳动合同法》，而仅为内部的一次整顿活动，但是外界却不以为然。华为事件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业内的领先者和强者，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应以何种姿态起示范作用？

在处理类似的事件上，富士康的做法却别具一格。2007年12月12日，富士康集团邀请了包括《劳动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常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副司长董平、全国总工会法工部副部长谢良敏等在内的“豪华”阵容，到深圳总部讲解《劳动合同法》，而且还通过视频连线与集团坐落在山西、天津、台北等处的共计70万名员工共同听讲。会后，富士康宣布与数万名已连续工作八年以上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富士康高调回应《劳动合同法》不仅提升了其以往为“血汗工厂”所累的形象，而且赢得了政府、媒体和劳工团体的喝彩。

在同样的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处理手法的不同后果。

至于孰是孰非，大家有目共睹。问题在于，能力越大的企业，是否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2007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发布题为《央企社会责任调查：不如民企 捐助仅占利润1.5%》的调查文章，认为掌握着国家垄断资源的“强者”应“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资费，是央企最应尽的社会责任”。文章发表后的半个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8年1月4日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指导意见》强调中央企业要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可见，强者的表率能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通过营造可持续发展氛围，以务实的姿态起示范作用。

媒体发挥的监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外部压力，是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利益攸关方。上世纪 90 年代初，也是因为媒体的监督而促使了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运动的开展，加之互联网这一新媒体的诞生和迅速发展，企业很难掩盖其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媒体在 CSR 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通过监督、曝光给不负责任的企业施加压力，利用舆论的力量督促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攸关的利益相关者



1991 年，美国大型牛仔裤制造商 Levi-Strauss 在类似监狱一般的工作条件下使用年青女工的事实被曝光，促使了世界上第一个生产守则的形成。1995 年，NIKE 在东南亚工厂有雇佣童工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引起了 NIKE 的信任危机。加之消费者运动和互联网的结合，在 90 年代中期，舆论的力量推动了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的发展，

也促使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的成立。

在中国，近几年由于媒体积极参与监督企业的不良行为，促使了企业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也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执法力度。2004 年“合艺电子厂风波”和 2006 年的“iPod 之城”事件不仅让国内的民众关注中国企业的劳工问题，也促进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完善。再者，近几年政府对媒体的态度更加开明，允许媒体对新闻做客观公正的报道。在目前 NGO 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尤其重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所说，“媒体‘守望’的不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守望’那些有可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的现象，可能影响人民利益实现的负面情况，同时协调社会各种机制来解决问题。”

除了监督之外，媒体在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3 年，《公益时报》刊登《企业公民专刊》，成为国内最早的传播企业社会责任的公益性媒体。同年，《21 世纪经济报道》在上海召开了国内第一次关于企业公民的研讨会，并专门作了一期特别报道——《企业公民元年》；

2004 年，《WTO 经济导刊》专门开辟了“国际竞争力 /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前沿报告”专栏，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撰写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文章；2006 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首次把“责任”作为关键字纳入评选的标准，之后联合《环球企业家》杂志等多家媒体发起“2006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并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白皮书》和《最缺乏社会责任感十大事件》，出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同年，由《公益时报》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公益性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是；此外，《英才》杂志和《北京青年报》等十家媒体评选“中国管理 100 人”，社会责任成为第一体系指标；另外，光明日报社设立的光明公益奖项，专门用于表彰跨国公司对公益事业贡献，鼓励跨国公司融入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努力；中央二套经济频道专门制作了一期针对企业公民的对话栏目，邀请了国内知名权威专家现场进行了讲解。2007 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兴锋提出的“媒体公民”理念，呼吁所有的媒体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更要履行作为一个特殊企业——媒体的社会责任²⁶。2007 年 3 月 29 日，《IT 时代周刊》北京大学在世界闻名的讲坛——北大百年世纪大讲堂，再次举办“问鼎 2006，谁是真英雄——最具社会责任感在华跨国公司颁奖”活动。

因此，媒体作为一个攸关的利益相关方，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更是要充分发挥监督和传播作用”，“倘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真的缺失，将不可避免带来整个社会信仰滑坡、观念迷失、伦理堕落——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工具，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与责任”²⁷。

26) 《2007 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2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的观点

那些事情我们还历历在目

2007年5月15日，河南电视台播出《罪恶的黑人之路》，暴露了山西“黑窑工”的悲惨生存状况，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其内容经网络传播后，最终演化成舆论“风暴”，引起了大量的外地媒体、中央媒体、境外媒体的介入，在媒体密集的关注中，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及有正义感的公民都被吸引到“黑砖窑事件”中来，对罪恶的抨击、对社会的反思、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追问，使黑砖窑衍生出的一系列话题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南方周末》2007年度传媒评点将该事件选为“致敬之年度舆论监督”，原因是“付振中的报道是将黑砖窑事件昭示于公共舆论的转折点，并促使事件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2007年10月8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了题为《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约束中国制造》的文章，披露了迪士尼中国代工厂存在诸如工人工资过低、超时加班、住宿和生产条件差及部分员工没有签订合法劳动合同等劳工问题。文章主要内容是围绕香港非政府组织 SACOM 的调查及 SACOM 与迪斯尼(亚太)有限公司之间的“口水战”为材料，揭露了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的局限性，并认为生产守则“跨国公司使用的公关伎俩，只是做表面文章，向日益关注企业生产责任的欧美消费者交差而已”。



2007年11月28日，香港学生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向网易发布独家报告，披露了戴尔供货商对员工的严重压榨行为，并要求戴尔全力改善其供货工厂的劳工待遇，负起企业社会责任。该组织同时在香港发起了抵制戴尔电脑的活动，试图将戴尔排除在香港高校学生机的采购之外。该报告经过国内媒体的相互转载，给戴尔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戴尔中国相关人士表示，报告涉及的三家工厂是众多IT公司的零件供应商，戴尔只是其客户之一，所以它们并不是戴尔的工厂，所谓“戴

尔血汗工厂”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并称近年来戴尔在华非常重视员工的待遇，其自身肯定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且也会督促其全球供应商符合相关的规范。SACOM则表示如果戴尔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其代工厂的劳工状况，将继续监督其供应链并呼吁香港的电脑采购机构与消费者“在其电脑采购合同中，加入劳工保障条款，保留追究跨国企业违反条款的权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7年的岁末，竟然是在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中徐徐远去。

迈入2008，媒体要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如何向民众传播责任奥运、绿色奥运、和谐奥运以及如何向世界展示责任中国将是媒体首要任务。

除了监督，我们还可以……

无可置否，媒体作为第三只眼睛，充分发挥了监督和信息传播作用。但是，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媒体往往对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情有独钟。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在《新闻业：幻象政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驱动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并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他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媒体的束缚。



因此，媒体在报道企业社会责任事件时，必须确保报道的准确性，并寻找途径与知名品牌和供应商进行合作，以共同努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另外，媒体应在地区、国家的层面更多报道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案例和活动，尤其是中小企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做法和商业利益等。而媒体从业人员也应学习更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知识，力求在采访和报道中通过更多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沟通相关问题，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向好的方向发展。

多年以来，中国工厂的劳工状况一直是国外媒体和人权组织攻击的对象，加之西方媒体的渲染和误导，中国工人被描述成一台工作机器，生活在没有自尊、安全保障和人道待遇的环境下。尽管有部分媒体的报道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侧面也证明了践踏工人劳工权益的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作为企业攸关的利益相关方，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非常重要，尤其是近年来整个沿海地区用工紧张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如何降低员工流失率和赋予员工在企业经营管理当中更多的权力对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尤为重要。30 年过去了，劳资博弈的结果是工人能有更多说话的权利，而且随着员工维权意识和法律知识的提高，工人的声音不能再被忽略。

这是一个可以用脚投票的年代

2007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到 2015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 10 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同年，社科院提供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 32%。另有 32% 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 75% 以上，至少有 1/3 的企业缺工在 25% 以上，并且“缺工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严重程度也远远高于 2004 年媒体报道的东南沿海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被彻底打破。

在劳工短缺的情况下，工人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他们甚至可以用脚对劳动待遇不佳的企业进行投票，而且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底气。在选择企业的时候，他们除了考虑薪金因素，还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可靠的保障、有尊严的生活。

近几年南下打工的人数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就是劳务工用脚投票的结果。2007 年 10 月，深圳劳动部门发布的《深圳市 2007 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深圳 2007 年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用工需求增长 13.6%，劳动力市场供求缺口达到 47 万人，其中制造业的用工需求量占五成左右。而东莞在 6 月份对 1.5 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调查后发现，17% 的企业承认有用工短缺，缺口达 27 万人。相反，

越来越多的人逃离珠三角，转战长三角。据《信息时报》消息，“2006 年广东省的外来务工者流失率超过 70%，其中来自长三角的竞争为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传统劳务工输出大省如河南、安徽的劳务工更偏向于长三角，例如 2007 年安徽省务工的 1000 万人中，有七成选择苏浙沪等长三角地区。

劳务工向东迁徙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长三角的快速发展以及其薪酬水平的提高，是吸引劳务工的主要原因。在 2006 年，中山大学做的《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农民工工资低过长三角、工作时间长过长三角、权益受侵害比率高过长三角。如珠三角的企业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较长（9.86 小时），长三角较短（9.01 小时）；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高出珠三角 265.66 元。其二，工作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长三角企业的厂房大部分是在 2006-2007 年建成的，无论是在住宿、工作环境方面，均比珠三角的企业优越。其三，政府没有建立理想的医疗、教育和福利制度，照顾劳务工；反而对他们进行政策性的排挤、歧视；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过度迁就和盲目偏袒资方，忘记了政府应有的责任：公平与公正。用脚投票，外来工选择离开广东²⁸。

因此，在工人可以用脚进行投票的年代，企业要留住人才，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势在必行，否则只会被员工唾弃。

28) 《新民工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羊城晚报 2007 年 3 月 15 日

80 后“漂”的一族

近几年来，企业除了要面对用工短缺、原材料上涨、工资上涨的种种苦恼外，还必须面对员工流动的问题。曾经有一名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其实我们不是招不到工人，问题是招到的工人很多都留不住”。工人辞工的理由很多，除了工资低、加班时间长以外，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等新问题也影响他们的去留，甚至连“冲凉房里面有蜘蛛网”、“厨房师傅做菜太咸了”也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为了解农民工的流动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课题组于 2006 年 4 月进行了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广东省东莞市的 3 个镇 9 个厂，涉及 3 种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共收回有效问卷 655 份。调查结果表明，“80 后”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 18.2%。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 71.4%。

随着越来越多 80 后加入打工者行列并逐渐成为主流，要妥善地用好“80”后一代的员工，企业要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采取新的举措。

一、建立完善的培训系统

目前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除了劳动力短缺外，另一个主要的瓶颈便是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尽管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大部分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缺乏技术支撑造成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们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没有基本的岗位培训。同时由于工厂缺乏长远计划，往往是什么好卖就一窝蜂似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变更，大部分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然后到市场上重新招，这就造成绝大部分工人难以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时间的，产业技能就无从提高。日本在技术开发上不占优势，但有一支世界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他们灵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是多年磨练出来的，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他们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现在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

没有给他们磨练双手的舞台，中国工人象流沙一样今年在这明年在那流动，他们难以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条件²⁹。

但是，在用工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有必要改变这种短视的行为。而且录用现成熟练工的成本和难度都在提高，这就迫切需要企业动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培养。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培养适合本企业的劳动力，同时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产业人才，促进社会就业，提升行业竞争能力。

再者，大部分 80 后工人出门打工并非“以挣钱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锻炼自己”、“学技术”、“长见识”，这是员工诉求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要根据这些变化转变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同时，如果企业能够提供给员工一个学习成长的平台，招募与管理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同时也可减少大量的招募费用。

企业内训可根据自身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培训，也可以设立了专门的员工技术培训部门。对新进员工进行技术培训，然后转入生产车间，同时将生产线上不熟练的员工或是无技术的员工安排技术培训。使员工在企业里优化流动，一方面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一方面可以系统的培养企业的技工人才。

二、转变管理理念

80 后的员工与上一代的员工相比，呈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他们年轻、有朝气、追逐自己的梦想和时尚的城市生活，而且他们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敏感和追求个性。正如广东工业大学学者涂钰青所言，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因此，管理者必须积极转变管理方式，切不可使用旧有的管理模式，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沉着应对，但也不能放任自流，管理人员需不断了解新的事物，尽量拉近与 80 后的代沟。

29)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世界工厂》

对员工中的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思想动态积极分析、沟通，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是最好的方法。企业必须加强对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辅之以教育引导，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帮助 80 后一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创造社会价值。

三、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

新生代民工成长环境相对优越，追求生活品质，他们中“有 76% 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³⁰。而且 80 后一代不会象上一代一样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也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而且，他们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³¹。

面对新生代工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企业需要积极改善生产现场环境，运用高效的机器设备，注意高温、噪音等因素的防护，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在生活方面改善住宿条件，提供宽敞清洁的宿舍，配备空调，独立的卫生间，具备一定的私人空间。生活区设立食堂、医疗室、图书室、网吧、休闲体育活动场地、常用的体育器材等等。同时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方便员工上下班出行。

近几年，大量劳务工东徙的现象就证明了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对于吸引和留住人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提高员工产业化意识

职业道德教育是提高员工职业化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新生代工人表现出的主要不足是缺乏产业工人的意识。而大多企业也忽视在企业内部进行必要的职业道德教育。众多的民营企业管理者与员工职业道德观淡薄，同时对职业道德缺乏基本的了解。在新形式下我们需要系统研究与反思职业道德问题，职业道德培训亟待加强与提高。

职业道德教育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参与，搜集与开发职业道德培训课程，并且在企业内部大力提

倡与宣传职业道德。通过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加速“80 后”民工成为企业人，培养爱岗敬业、积极创新的“80 后”一代新民工。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看不见的生产力，一个企业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直接影响着进入企业的员工的行为。“80 后”一代思想敏锐，敏感度高，对企业文化的感知很迅速，也会做出明确的行为反应。如果进入一个企业不适合自己的业，新一代的民工会考虑离开。因此，企业在营造企业文化的氛围时需要系统思考与运作，能深刻影响到员工，帮助员工树立企业的基本价值观；传播的形式可以通过一些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员工理解与感知到企业提倡的基本理念，通过参与活动、参与管理的形式深化对企业文化的感知和理解。管理层坚持按照企业提倡的理念转化为实际的行为。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背负起全面构筑企业文化的责任……

随着越来越多 80 后和 90 后工人进入城市并加入产业工人的大军，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新的课题，如何因势利导和处理好新生代工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也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30)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观点

31) 广东省统计局 2006 年抽样调查

CSR：工人不应缺位



2007年3月8日，浩威玩具厂的工人黄任忠、崔长勇、陈以诺、张之坤、刘清明，分别将龙岗区劳动局推上被告席，把用人单位作为第三

人，诉龙岗区劳动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不作为，请求法院判令劳动局对第三人行使诸项责令权。4月11日，该案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法院于5月8日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然而，由于「浩威五君子」事件牵涉跨国巨头迪士尼公司、劳动执法部门和劳工维权这些敏感话题而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4月29日，官方媒体《法制日报》刊登「深圳5工人起诉劳动局不作为」引出浩威厂的问题；5月14日，《法制日报》头版再刊登「代工厂被控『血汗工厂』迪士尼公司沉默以对」文章，将矛头直指迪士尼；《南风窗》在六月份也以「『三家村』里的维权困境」为题作了专题报道；7月25日，《南方都市报》再刊出「五工人闯出维权新路」的报道；7月29日，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星期日档案》，更以「血汗工场」为题，对他们做了一个15分钟的专访。剖析该事件引起境内外媒体关注的原因，除了当事人独特的身份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善于利用媒体和非政府的力量与资方博弈。

尽管「浩威五君子」的维权之路漫漫，而且要告倒政府部门并获得巨额赔偿的可能性不大，但「五君子」为更多的工人指明了一条维权新路，用法律维护公民的权益和尊严。其后，在南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群体维权事件，尽管有部分个案缺乏理性，但对于缺失罢工权的工人而言，这些都是大胆的尝试，也折射出当下“工人有集体行动”的维权趋势。

2007年4月7日，隶属于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负责装运卸载的800余名吊车工人发起了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员工待遇并建立工会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益；4月20日，安徽阜阳华源纺织厂约3000名工人罢工，抗议厂方给工人

的薪酬过低，及在重组企业架构时漠视工人权益。4月25日，深圳佳智服装公司300余名工人在厂外发起罢工，之后乘车到盐田区政府上访，抗议厂方要求他们签署不利员工的新合约，并要求当局协助员工追讨加班费；5月29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爱威电子厂上百员工在工厂进行罢工，抗议工厂在没有任何经济赔偿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5月30日，深圳宝丽顺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近二千名工人因听说该厂即将倒闭，担心厂方任意缩短续约合同期限以躲避支付解约补偿金而集体罢工；6月1日，东莞钜旺鞋厂工人因不满厂房克扣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故意罚款、辱骂工人、伙食低劣、缺乏社保医保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上街游行；6月6日，东莞凯元手袋厂工人集体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工时；6月15日，东莞大朗镇永兴玩具公司近2000名工人罢工讨要拖欠了两个半月的工资；8月3日，江西江维高科厂爆发2天大罢工，全厂几百名工人认为，其薪酬在过去10年未有调整，现时200元基本工资加上近500元的奖金，在扣除社保后，远远不足应付现时的物价；8月22日，深圳飞煌手机组装工厂5000多名工人集体罢工不满公司延长工时、变相降低工资，发起集体罢工，并要求与资方谈判；10月30日，深圳华洋印务有限公司多名工人因不满被公司拖欠工资将107国道西侧封堵，要求工厂立即支付工资；11月1日，广州日成玩具分厂500名工人堵路3小时讨要加班费；11月27日，东莞爱高电子厂数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厂方擅自提高伙食费；12月14日，广州恒光电子厂百余名工人集体抗议，要求厂方对最低工资做出保障；12月19日，深圳



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因待遇问题而与厂方发生冲突，最终走上街头游行；12月26日，理光（深圳）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千余员工早餐后拒绝走上生产线，抗议公司新评价制度实施两月来，劳动强度增大而多数员工工资却在下降……

发生在南方的一连串罢工事件不仅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但“工人有集体行动”的趋势正是对罢工权缺失的呼唤，尽管工人要完全行使“集体谈判和自由结社”权尚需时日，而且中国的罢工权问题由于涉及到中国的人权状况评价，又与工人队伍的稳定和社会安定直接相关，因此比较敏感，但是随着中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加入 WTO，劳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通过法制手段来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有必要加快罢工立法，积极和正面对罢工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认为，“罢工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现象是由劳资矛盾引起的，没有罢工立法，也不会消除这种现象，实施罢工立法，罢工现象则会有所遵循并便于规范处理。目前那种将罢工与游行、示威等不同性质的行为混在一起，统统作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恰恰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增加了问题处理的难度。罢工是企业范围内的劳资矛盾的表现，而游行示威等行动则主要涉及到与政府的关系。而压制罢工或不保护合法罢工，直接的结果是将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促成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结果是政府替雇主承担了责任，并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在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的处理原则之一即是劳资自治，政府不再介入劳资关系之中，而是在这一关系之外对其进行监管和协调。从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实施罢工立法，恰恰是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有效发挥政府作用、长期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法律举措”³²。

「浩威五君子」事件和“工人有集体行动”的趋势反映了工人维权意识的提升和要求正义、尊重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他们更善于利用舆论、法律手段进行理性维权。但是，由于相关机制的缺失和民间组织得到政府的认可度低，作为 CSR 第三推动力仍难成气候，加之资方的恶意打击，维权人士的处境非常严峻。

2007 年 11 月 13 日，深圳龙岗“公民代理”李金薪遭到不明身份男子的绑架和殴打，右肱骨、右腓骨多处骨折；11 月 20 日，深圳龙岗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的负责人黄庆南遭遇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几乎被人砍断左腿。事后，由于境外劳工团体和媒体的介入、国内舆论的压力，全国总工会和深圳市政府高度关注此事，并成立专案组侦破此案。然而，国内劳工 NGO 的处境依然令人尴尬，“大多以工商登记的方式存在，靠境外劳工组织的支持维持生存，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和活动持默许的态度，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时候，这些劳工团体自身的权益却往往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³³。如何正确疏导民间的自发力量，协调好公权力与社会自发力量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的机制让它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问题，是政府所要做的事情。依靠公私两支力量的共同推进，是解决劳动者权益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一味对他们实施“打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批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的民间力量会走向对立面，可能会演化成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为此，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采取一定程序把这批职业维权群体“收编”在工会等部门，目的是把劳资冲突牢牢控制在内部干预的范围之内，与政治稳定保持一致。

作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第三方”力量，如何发挥“杠杆和平衡器的作用”？如何与企业合作，杜绝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共同促进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向前发展？这是国内 NGO 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32) 常凯《论中国的罢工权立法》

33)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黄岩研究结论

第三部 全球化浪潮下的 CSR

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而言，2007 年是充满变革的一年。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讨论供应链问题时，开始关注能力建设，探索监察之外的可行之道。再者，越来越多业内领先者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问题，并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参与环境保护当中。

供应链篇

2007 年 1 月 15 日，英国大型零售集团玛莎 (Marks & Spencer) 百货向外公布其 A 计划，一个包含 100 项承诺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减少废弃物、保护自然资源、道德贸易和崇尚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五大部分。2008 年 1 月 15 日，玛莎向外公布了 A 计划的进展，在供应链方面，玛莎在 2007 年向全球 12,000 家供应商进行了经验分享互动，以尝试在供应商当中分享良好的实践或新的做法，达到提升供应商的能力以满足公司在供应链上推行社会和环境标准的要求。玛莎认为，仅仅通过制定标准并要求供应商符合这些标准否则将被剔除作为供应商资格的做法只会严重破坏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供应商在没有达到玛莎的供应商标准之前需要投入改善资金，玛莎将帮助供应商获取资金赞助改善目前的问题，这些资金来源包括公共部门和慈善机构。玛莎富有创新的举措在于帮助那些没有达到要求新兴国家的供应商能继续留在供应链上，以改善当地的经济水平。A 计划的目的不仅能大大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改善为消费者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且也能增强玛莎的竞争力，譬如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客户忠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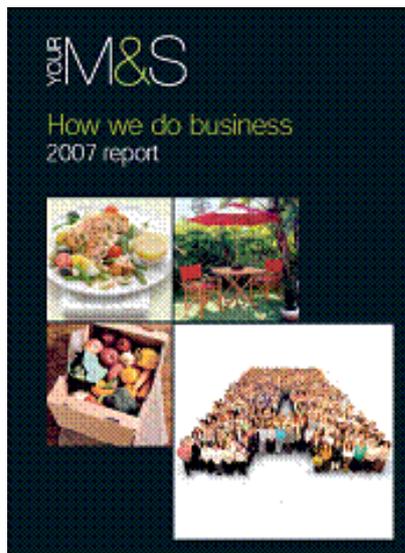
2007 年 6 月，NIKE 发布其 2005-2006 财政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承诺将实施一个旨在 2011 年以前消除供应链中工人超时加班的“宏伟计划”。该承诺被视为该年度报告最具震撼的焦点。至此，倍受公众关注的运动鞋品牌 NIKE 在供应链劳工问题上领先提出了富有创新的方案。根据 NIKE 负责社会责任高级主管 Charlie Brown 的观点，“单纯的监督取得成效似乎不大。然而，将监督与其他旨在重点解决导致

恶劣工作环境根本原因的干预手段结合起来——譬如提高供应商更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的能力及提高他们生产的质量及效率，工作条件将有很大的改观”，并相信“将精益生产的理念整合到人力资源管理当中可以确保工作条件可持续的改善”。Nike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作者们呼吁建立一个更

加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审核但超越审核），其中结合了可以利用来自或政府或工会或劳工权益 NGO 的外部压力、全面而透明的监督体系以及致力于根除引致恶劣工作环境的根本因为目标的“管理系统”。

2007 年 8 月 15 日，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超越监察和能力建设是报告的一大亮点。报告提到，“道德采购政策正向超越监察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道德采购政策也面临了导致违规的日益复杂的根源问题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的挑战。沃尔玛看到了工厂工作条件的改善也见证了道德标准所产生的成功个案。但遗憾的是，沃尔玛也看到相同的违规不断重复发生”，并认为以下措施能确保供应链可持续的改善：（一）加强对沃尔玛买家、采购员和采购经理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公司道德标准，这样他们在与供应商沟通和进行采购决定时能遵守道德标准的要求；（二）工厂在生产沃尔玛的产品前必须进行道德标准和质量体系的预审核。工厂只有取得黄或绿的结果才能开始生产。今后三年内，将分阶段对沃尔玛直接采购和国内采购的工厂进行预审核，首先从沃尔玛直接销售的产品开始，之后是玩具和服装；（三）建立供应商表现记分卡，其中包括道德标准指标。对于得分较高的供应商和工厂，将加大未来的订单量进行奖励。另外，沃尔玛还进行了诸如“模范工厂计”、“五家工厂计划”和避免“审核疲劳”措施等旨在提高供应商自我改善能力的试点项目。

品牌商和零售商在 2007 年新的尝试证明了大多数工厂监督程序缺乏效力以及通过第三方审核机构进行的工厂审核存有种种弊端和缺乏可信度，是时候探求审核以外的方案解决长期存在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问题。2007 年 7 月，美国商业社会责任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会议上提出了“超越监察解决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新主张，认为要确保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供应商的意识，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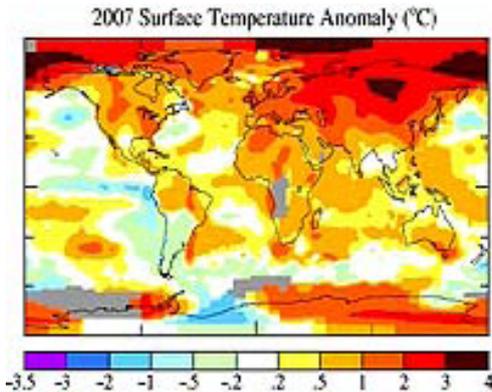
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次，政府部门要积极参与，通过公共政策确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三，赋予工人说话的权利，提高工人的参与意识，确保内部沟通顺畅；第四，买家内部要一致。

新一代供应链的解决方案除了关注能力建设外，还注重品牌间和组织间的合作，通过统一标准避免重复审核，减少供应商的改善成本。为此，沃尔玛在 2007 年 4 月宣布接受 ICTI（玩具行业）认证，表示通过 ICTI 认证的工厂可以豁免沃尔玛内部的道德标准（ES）审核。随后，Sears、Disney 等零售商和品牌商纷纷表示接受 ICTI 认证。

2007 年 12 月，运动和服装品牌 NIKE、A&F、Levi Strauss 和 Nordstrom 宣布加入 FFC（公平工厂数据库），通过共享供应商的道德表现数据，达到减少审核次数的目的，从而让供应商能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改善。

2007 年 12 月，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公开其全球供应商的信息，这是继 NIKE、Levi Strauss 和 Timberland 之后的又一家运动和服装品牌在供应链透明度方面所作的努力。Adidas 此举不仅回应了劳工组织对供应链透明度问题紧追不舍的指责，通过公开供应商信息，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监督其供应链。公开供应商信息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品牌商采纳，而且“在确保供应链更加透明的同时却没有带来任何影响竞争优势的负面影响”³⁴。

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进行统一标准，增强利益相关方对标准的认知，并建立商业守则案例，跨行业或跨国界推广这些标准，并激励相关方积极参与。品牌商和零售商则应对遵守生产守则的做法进行奖励，否则没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将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而日益激化的商业竞争正危及这一暂时方案。



气候变化篇

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的核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环境外交和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在众多国家被列入政治议程，而且还成为近两年来多个世界领导人峰会上的重要议题。

2007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发布的《2007 年全球风险》报告称，气候变化是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由全球变暖造成的自然灾害今后数年内可能会导致某些地区人口大规模迁移、能源短缺以及经济和政治动荡；2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巴黎发表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部分。报告得出结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得不到缓解，气候变化将引发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更多自然灾害；3 月，在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 2020 年将欧盟温室气体

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至少减少 20%；6 月，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之一；9 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悉尼宣言》，重点阐述了各成员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共识。同月，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80 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这次会议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召开的最高级别会议；10 月，诺贝尔委员会将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表彰他们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贡献；11 月，第三届东亚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各方达成“巴厘岛路线图”，为人类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指引了前进方向。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政府的高度参与和国际合作确保了一系列公共政策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商界也开展了一系列减排的措施。

2007 年 9 月下旬，沃尔玛要求其供货商提供自己在提高能

34) NIKE2006 年度报告

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数据，并开始监测 25 到 30 家供货商的碳排放情况。这些公司为沃尔玛提供 DVD、牙膏、肥皂、牛奶、啤酒、吸尘器和软饮料等七类产品。

2007 年 10 月 9 日，包括宝洁、联合利华、Tesco、雀巢公司、Imperial Tobacco 和吉百利食品有限公司在内的至少 6 家全球最大企业宣布，它们正联合起来向自己的供货商施加压力，要其公布碳排放相关数据和旨在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策略。此举将影响到从 T 恤衫、可可豆到剃须刀等众多产品的生产厂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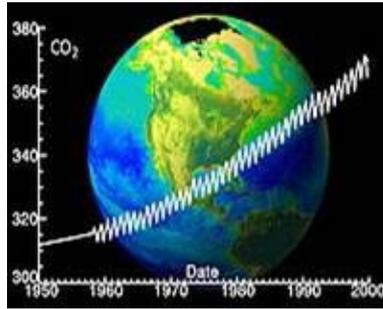
推出此项计划的跨国公司组成了一个名为供应链领导者联盟的团体，其成员公司最终将能利用相关信息对供货商进行评估，以促使后者竞相提高自己的环保资质。该团体与位于伦敦的非营利组织碳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简称 CDP) 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公布世界上很多大公司的碳“足迹”数据 (商业活动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值)。CDP 将为该团体的成员公司调查其供货商的碳排放情况。

2007 年 10 月，戴尔在北京宣布成为世界主要 PC 商中首家在全球范围实施碳中和的公司，通过相应措施减少及消除排放气体的总量和影响。为了实现碳中和承诺，戴尔将实施积极的策略推行更多节能措施，尽可能购买可再生能源，抵消剩余有害物的影响。



2007 年 11 月 8 日，英国维京大西洋航空公司计划将“碳补偿”同香水、名酒等免税品一起在航班上向乘客出售；2007 年 12 月 5 日，全球第五大航空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宣布，与非赢利机构可持续发展旅游国际组织 (Sustainable Travel International) 合作，推出碳补偿计划 (carbon offsetting program)。这项自愿性的计划可以让美国大陆航空来自全球的客户了解到其选乘航线行程的碳排放量 (carbon footprint)，并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旅游国际组织所计算出的美国大陆航空航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向可持续发展旅游国际组织进行补偿捐献。

2008 年 1 月，一份对世界 40 大银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调查报告出台，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日本、美国和欧洲国



家的银行开始回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如成立环境问题委员会、增加了首席环境官员、减少内部温室气体排放、支持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投资清洁能源项目等。根据这份报告，

银行已经开始的回应气候变化的正面行为包括 4 个方面：发布了近 100 个关于气候变化和投资策略的研究报告；40 家银行中的 34 家配合了非营利性组织——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上一次的年度气候公开调查；28 家银行计算了它们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量，24 家设定了内部减排目标；29 家银行正在支持可替代能源项目。并建议“把评估气候变化作为董事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投资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更大程度地公开减排策略和投资导致的碳排放量；解释自己是如何把碳成本计算到贷款决策中的，尤其是那些能量密集型产业；设立更高的目标来缩减投资中的碳排放，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上对公众更加透明”。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将面对凶险，但是如何去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排放量难以进行稳定控制。因此，想有效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需要现实的态度和务实的方法。英国财政部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曾在一份报告中首次详细分析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低碳能源技术及其它低碳商品将形成新的市场，不仅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还可相应扩大就业机会。他认为，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矛盾。理由是能源科技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将为我们创造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不过，要想在这方面有所成效，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对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制定明确的价格，让减排交易活跃起来；激励一些能够降低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技术研发，包括提高效率，研究碳捕捉及封存技术，提高核能和生物燃料的使用，扩大植树造林。

另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在全局的范围内进行合作，除了政府间的合作外，商界的积极参与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能源篇

能源和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安全和发展最重要和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能源问题不仅对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环境和气候也构成威胁，可以说能源问题已成为全球安全方面最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商界和政府开始致力于寻找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其它能源。可再生

能源由于其清洁、无污染、可以再生和永续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因此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高度重视。2007年初，欧盟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要求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2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全部发电量的30%。此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国也制定了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引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欧洲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和绿色和平组织近日发布研究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这意味着未来50年，可再生能源将发挥主力军作用。

除了政府极力倡导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参与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中。

2007年1月，全球最大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在美国的分店采用太阳能系统，并把可再生能源是沃尔玛环保政策的中心。减少“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也成为正式的公司政策。



沃尔玛三项具体的长期环保目标分别是：使用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零污染和销售出自可持续利用资源的产品。并承诺在接下来的4年内，沃尔玛将致力于开发可提升25%至30%能源效率的建筑原型，并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

2007年3月，美国银行表示未来10年将在“绿色项目”上投入200亿美元。并承诺扩展现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向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3家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3年内购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发

行的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

2007年4月，百事公司(Pepsi)宣布购买了11亿多度的可再生能源证书，成为“美国环保署绿色电力合作伙伴”项目至今最大的购买家。百事公司认为，购买RECs证书能够支持美国剩余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同时也是解决由传统用电方式所引起的环境问题的一个途径。同月，EarthColor公司宣布将为其位于美国的所有工厂购买清洁而无污染的风能进行发电，并承诺将100%采用风能发电——这是印刷业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购买可再生能源的行动。

2007年11月，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Google)组建可再生能源研发部，将首先关注先进的太阳热发电和风力发电技术、增强式地热开采系统以及其他潜在的突破性技术。谷歌的目标是建成一个拥有十亿瓦发电能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成本将低于煤发电。

除了企业热衷于可再生能源外，资金市场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追踪主要业务为抗击全球变暖公司的KDL全球气候100指数(KDL Global Climate 100 Index)，在过去12个月内上涨了25%。成立于2005年的PowerShares WilderHill清洁能源组合基金(PowerShares WilderHill Clean Energy Portfolio)，追踪40只关于清洁能源产业的股票，上市以来的回报率为30%左右。这只颇受退休者欢迎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向投资者宣称：你在为环保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回报可观；根据基金评级公司晨星的数据，过去两年专注于投资“绿色产业”的美国共同基金和ETF从12个增长到21个，6月底资产达到41亿美元。

《气候变化：在天气变化之外》一书的作者、瑞银集团财富管理研究人员Kurt Reiman认为，环境政策将彻底改变相关企业的盈利状况，“这远远超出社会责任的范畴”，并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个彻底性的变革。如果你不关注环境，你的生意将难以为继”。耶鲁大学环境法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艾斯缇则认为，真正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于可以长期带来收益的项目。

因此，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开发将是企业社会责任未来发展的重点，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认为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而且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未来：没人能置身事外

回顾 2007 年，我们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企业的主动性或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方面。但是，2007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如何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改善和劳资关系和谐发展是 2008 年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点课题。随着 2008 年的来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如何向世界展示责任中国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一大举措，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和可再生能源问题则是“软实力”不断增强的标志。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主体是企业，但是对于政府、民众、媒体和资本市场而言，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可持续发展水平不但反映了一个国家责任竞争力的强弱，而且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普罗大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媒体和资本市场如何通过舆论、资本倾斜引导企业创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减少碳足迹变得尤其重要。

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使用手中的购买力引导道德消费，通过积极倡导道德贸易减少“血汗工厂”现象、减少使用童工

现象；同样，作为公民，我们应该节约能源、保护日益减少的水源，通过碳补偿的方式减少自己的“碳足迹”；作为企业，我们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策略带动业界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目标的一致；作为政府，应该完善公共政策确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通过激励机制和市场手段促进绿色贸易、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将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也随之不断扩展。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对每一个人而言，对环境污染、清洁水源、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问题不能置身事外。任何漠不关心和旁观者的心态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以身作则、从我做起积极参与预防污染和节约能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则是一个负责任和有良知的公民所为。否则，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将是毁灭性的，人类将万劫不复。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同盟

企业社会责任同盟（CSRA）是中国一家旨在提高道德贸易意识、提供改善供应链方案以及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独立机构。CSRA 团队是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极高热诚、对公平劳工及可持续发展有着强烈信念的资深社会责任专家组成。

早在 2005 年，我们发布了公共平台（CSR.org.cn），目的是在中国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分享企业社会责任良好实践和最佳运作。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网站已经成为中国以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新闻及资源为内容的主流媒体之一。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先驱，我们一直致力于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付诸实践。除了网站平台服务之外，企业社会责任同盟也同时向广大客户提供咨询、培训调研等各项服务。CSRA 团队使用创新工具和方法以及超前的风险管理策略捍卫客户供应链的诚实可靠，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劳工权益及安全标准的改善和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同盟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东方广场 2210

邮编：518001

电话：0755-33200278 82174582 82174583

传真：0755-33200279

www.CSR.org.c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lliance

Address: No. 2210 Oriental Plaza, Jianshe Roa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C

Code: 518001

Tel: 0755-33200278 82174582 82174583

Fax: 0755-33200279

www.CSR.org.cn